

真理的追求

十年文萃

(1990.7—2000.7)

下

◆ 《真理的追求》杂志社 编 余征 主编

Z H E N L I D E Z H U I Q I U S H I N I A N W E N C U I

金城出版社

真理的追求

◎十年文萃

(1990.7—2000.7)

下

◆《真理的追求》杂志社

编

余征

主编

H
E
N
L
I
D
E
Z
H
U
I
Q
I
J
U
S
H
I
N
I
A
N
W
E
N
C
U
I

金城出版社

立场与投枪

“被混蛋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

左 迁

这是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话。契诃夫是我们中国熟悉的。苏联有些学者说他缺少明确的完整的世界观，这常使他的作品显出灰色，也给他精神上带来苦恼。这看来颇有道理。但尽管如此，我们看上面的话，是非却是这样分明，好恶又这样热烈！这简直是一个坚定的战士的口吻。

契诃夫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人物，至今过了不下 80 年。而现在有些人的言行却常常使我们记起契诃夫这句话，并且不免感慨系之。

1949 年，全国解放，毛泽东主席在真正成了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旧中国生活过，受难和斗争过的人都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但不知怎的，近些年来，有些人却又重新跪下来了。他们实际上也和解放前的洋奴买办一样，对洋人无不敬畏。洋人说好话了，也不知人家是真心还是假意，就都受宠若惊；洋人生气了，便惶惶不可终日。

前些年，不是在国内批评了电影《太阳和人》么？有些一心要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洋人果然生气了，港、台一些和洋人一鼻孔出气的报刊，也叫嚷起来。经过他们这么一压，我们有些人便沉不住气了，说是以后的“文艺批评”也要改为“文艺评论”

云云。

用不着说，洋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好有坏，有同情我们乃至和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当然也有所谓混蛋。混蛋的明确的定义虽然还未见于辞书，但至少，把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家伙称为混蛋，大约总不至于被认为是扩大化的。那么，一个正直的爱国的对社会主义有坚实信仰，因此也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有什么理由对那些敌视我们的反动家伙的叫嚷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呢？

同理，对于那些坏家伙对我们的称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感到光荣，而不是感到耻辱呢？

代表反动势力的鬼蜮们，他称赞你，对你表示友好，如果有真心的，那你至少实际上和他同流合污，或者他认为至少有可能和他同流合污，因此才看中了你；如果你本来不是这样，而是站在正道上的，那他们对你的称赞或友好的表示，便是伪善。但奴性十足的人却连这个浅显的道理也难于领悟。

大约一年多两年之前，有一位本职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且曾经身兼研究所所长职务的人，在国外被请到人家的国会上演讲，这一下，很使他受宠若惊，喜不自胜了。他回来对别人说：你看人家多民主呀，能够让我在国会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没有想一想，他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已变色了，他因此受到共产党的党纪的处分，人家当然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人家看中他的正是“变了色”这一点。须知，对他们来说，变了色的马克思主义有时比本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更有用场。

还是丁玲应该受到我们崇敬，应该为一切正直的知识分子引以为荣。她被请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去访问，人家本来以为，丁玲几乎半生都受到政治上不公正的对待，在国外是会说点中国的坏话的。但她却不，这个经得起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国

外也和在国内一样，谈文艺依然是赞扬为人民的方向，只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是说得更委婉、更动听了。但也因此，人家本来准备给她安排的许多访问的项目也被取消了。她受到的不是赞扬，而是冷落。

但丁玲是否因此便惶惶不可终日呢？从她所留下的遗文，从她的言谈，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确信，丁玲是会为她在国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感到自豪的！

“被混蛋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

1990 年第 2 期

元宵感言

魏巍

今天是元宵佳节。我来参加党中央召集的文艺界朋友的聚会，非常高兴。这使我想起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在紫光阁、在新侨饭店、在青年艺术剧院同文艺界人士的那些会见。我们党的领导人像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领导同志，都是热心关怀文艺工作的。他们对文艺界的朋友，既有鲜明的原则性，又有亲密的友好关系。这应该说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今天的元宵聚会，我感到这种传统又回到我们身边。我既高兴，又深为感动。面对着自己的党，自己的同志，我说几句心里话。

我认为当前对于我们党最危险的，也就是足以威胁党的生存的，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腐败现象，一个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党的肌体上两个孪生的毒瘤。这两个毒瘤不除掉，我们迟早要吃大亏。即使我们的经济搞上去了，也会被它们摧毁，这里我着重谈一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

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有目共睹的，我想已经不需要多加证明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政治思想战线上确实出现了转机，资产阶级自由化得到一定的抑制，文艺工作在“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方针的指导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老实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任务还很艰巨，决不

能对成绩估计过高。这个工作看来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很认真，有的地方就很不认真，还有不少人是持观望态度，看这个风到底是往哪里吹。这样的地方你怎么能说它有很大进展呢？再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种种自由化观点的散布，已经不是一天半天了。过去不少报刊散布了那么多错误的东西，对我们的青年造成了很深的毒害。你只要研究一下青年的思想，许多错误观点都可以在报刊上，以至讲坛上找到来源。而今天要来分清是非，加以澄清，这个工作是相当艰巨的，何况还没有深入去做。从表面看，现在很平静，情况缓和多了，但能不能说已经消除了潜在的危险呢？恐怕还不能这样说，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

从外部情况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国际阶级斗争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或看法为转移的。有帝国主义存在，有反社会主义势力存在，有反共产党势力存在，我们就不能认为天下太平，高枕无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不但不会放弃，而且由于东欧的事变而兴高采烈，变本加厉。他们高喊的“民主”、“自由”、“人道”等等，实际上都是进攻社会主义的武器。他们把这些武器公开或秘密运送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交给一些人，用来进行颠覆活动。这是头脑清醒的人都懂得的。

看来，我们还应该深入地进行反帝教育。我们同帝国主义的买卖尽可以做，但是不能有丝毫的幻想。我们要百倍加强自己的力量，其中也包括精神的力量，精神一旦解除武装，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会陷入可悲的境地。

鉴于以上内外情况，我希望全党要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最好中央能做出相应的决议，以便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四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快要两年了，别的大政方针都有了，为了彻底纠正过去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应该专门研究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作。其中，自然包括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进行到底。

所谓“到底”，就是坚持进行，不要中途停步，不要半途而废。这是联系着过去的经验教训说的。过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曾经三起三落，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每次反复，都要给一些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心灵留下伤痛。每次反自由化都是党布置的，执行人是抱着贯彻党的指示去工作的，但过不了几天，又说你错了，甚至把你拿下来。这是很不公道的。1987年那一次动员反对自由化，我曾经说：上面要没有决心，就不要进行了吧！我自己也觉得这话是够难听的，但结果还是被我不幸而言中。我希望今后再不要有这种情况发生。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我的理解，决不是要把谁打倒。把一些人打倒，否定他们的历史，否定他们的成绩，那是“四人帮”的作法。这些都过去了。决不会再重复了。我们针对的只是一种思潮，是那种对我们危害最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也可以说是反共思潮。出于无产阶级和民族的利益，我们不能不进行这场斗争。这是一场有高度原则性的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斗争。

至于学术讨论，同志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那是一种正常的思想交流，一定要做到与人为善，方式也尽可能地讲究，并且要允许反批评。我认为正常的健康的文艺批评，是有益于我们文艺事业的发展的。过去鲁迅、郭沫若、钱杏邨这些革命的文学前辈，互相之间都进行过批评，照他们的办法开展批评，只能活跃我们的文艺工作。但是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总是把文艺界的争论看成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是“窝里斗”，是“永远扯不清的纠纷”。这不符合事实，而且模糊了问题的性质。从我个人来说，大家对我不错，我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为了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

文艺，文艺界是必须团结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政治基础，当然也是文艺界团结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结。才是最巩固的团结，团结安定，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我们没有理由不更牢固地团结起来；但是反对自由化的斗争同团结安定决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有消除一切不安定的因素，才能达到真正的安定。七中全会的决议号召我们把经济搞上去，这也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但是，这同全面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也不是对立的。只有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做到万众一心，发挥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更有效地把生产搞上去。依据过去的经验，就生产抓生产是万万不够的。在这方面，我们文艺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文艺工作就是要唤起人民的热情，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当前世界风云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极大挫折的历史关头，我们党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力挽狂澜，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毛主席有一句词，叫“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我看拿它来形容当前的中国，是恰切不过的。中国的坚定姿态不但为世界进步人士所称赞，也使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感到骄傲。让我们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周围，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搞得更加繁荣！

1991年第5期

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考

刘白羽

明年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我认为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项重大事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五十年漫长的岁月的考验，是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的。

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研究的确是十分应该、十分必要的。应该结合马列、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结合中外经典的美学理论；特别应该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的现实来进行学术研究，学术才不致变成脱离实际的“纯学术”，学术才能上升成为理论，才能指导推动我们当前和今后的文艺运动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有一个宏观的长远的战略的设想。用最简括的话说：就是抓紧 90 年代深入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生活，创造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高峰。

我为什么把深入生活摆在这样一个突出的地位呢？从我切身经验来说，我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精髓，不仅是从理论上阐明了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更重要的是指出作家到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生活中去这一伟大的实践行动。当年正是沿着这一条道路，有的人参加了土改，有的人参加了战争，作为作家这个人改变了，才改变了新文学的面貌，创造出真正新世界的文学。谁要

忽略这一重大的实践行动，谁就只能半截子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的威力在于行动，就是在于创造现实。创造社会主义生活这个现实，而后创造社会主义文学这个现实。因此作家去不去同前一个现实结合，必然决定对后一个现实能不能作出贡献。当然，一个作家首要的任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到人民群众中去的明确目标和到人民群众中去的热情，即使去了，也不能深刻地理解现实生活的本质，当然也不可能从人民群众中取得硕果。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一原则来说，到人民中去！深入人民火热斗争！我认为这是我国发展文艺事业根本的根本。这决定性的一环，实在太重要了。这是一个艺术的法则，谁要违背了它，谁就受到惩罚。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很早以前就说过：不要总是写深入生活吧！他的意思是应该研究更高超的理论，结果他走到了宣扬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的玄妙的“高处”去了。只要我们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者，我们就决不能头朝下脚朝上，把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颠倒过来，就决不能对生活问题采取蔑视的、鄙薄的态度，不但创作永远不能脱离生活，学术也永远不能脱离生活。生活万古长青，言之不尽，用之不竭，谁要脱离它，谁就只能走到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斜路上去，这种教训，不仅是理论家值得记取，首先作家必须牢牢记取。

当然，对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不同的历史时期，还要有更深的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不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更不是庸俗的唯物主义者，我们是客观反映与主观能动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事实的确如此，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决不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口号，而是亘古以来的美学的规律，让我们听一听老歌德的话吧：

“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彩，你不会缺乏

作诗的动因。但是写出来的必须全是应景即兴的诗（指从客观出发的诗），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必须既提供诗的机缘，又提供诗的材料。一个特殊具体的情景通过诗人的处理，就变成带有普遍性和诗意的东西。我的全部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不要说现实生活没有诗意。诗人的本能，正在于他有足够的智慧，能从惯见的平凡的事务中见出引人入胜的一个侧面。必须由现实生活提供作诗的动机，这就是要表现的要点，也就是诗的真正核心；但是据此来熔铸成一个优美的，生气贯注的整体这却是诗人的事了。”

毛泽东提出“源泉”，歌德指为“核心”，这就说明毛泽东提出的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难道只符合于马克思，而不是更符合歌德吗？前几年有人反对深入生活，那才是真正的既反对了马克思，也反对了歌德，显而易见，这是完全错误的。无源之泉，不会流水淙淙，无根之木，岂能绿叶葱葱。

现在我们从创作艺术角度来研究一下吧！文学是人学，这不只是艺术哲学的概括，同时也是创作艺术的导向。文学主要是写人，写人的心灵，写人的命运，写人的悲欢离合，塑造人最难塑造的是人的灵魂，但没有灵魂的人物形象是不能感动人的。只有反映人生的文学，才能是为人生的文学。但要做到这一点，这就必须涉及到写自己熟悉的这一个决定性的根本的问题。但在这里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种认为我最熟悉的是我自己，请你们看看我的魔法吧！这就是理论上提倡“主体”，创作上提倡“自我”，于是就来了“贵族文学”。其实这种现象并非始于今日，鲁迅早就指出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坐在客厅里谈社会主义，更何况我们现在这些“可爱的聪明人”提出“淡化政治”，那就连社会主义也不用提了，而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了。这些等候劳

动阶级捧着牛油面包来奉献的人，他们根本无视客观现实，更瞧不起人民群众。因此他们写出来的文学也只是给他们那一个小圈子欣赏的文学，与人民群众是没有关系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种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一个细节、一个形象、一个语言，仔细分析起来都有他们现实来源之处，小说里边的人物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无一处无出处，生活之于创作艺术真正可谓“一枝一叶总关情”。但，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要写创造这个新世界而又建设这个新世界的英雄们，这些人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的劳动人民大众。他们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最伟大的人。这样就来了一个问题，你要通过写他的心灵、他的命运、他的悲欢离合，写出他的崇高的品德、高贵的精神、推动人前进的那一种高尚的灵魂，就必须他们是你所熟悉的人。如何熟悉？只有迈开两脚，走到他们当中去，长期地深入火热斗争生活，把不熟悉的变为非常熟悉的。这里当然就有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变化的问题，只有你自己已成为一个战斗者、建设者，具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才有了劳动人民的品德风貌，你才能用你的灵魂补充你塑造的人物的灵魂。很多古典作家说过，小说中总有作者自己，福楼拜甚至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但作家自己如果不是劳动人民化了的，把“精神贵族”的东西强加在劳动人民身上，那就只能是谬误的艺术，其实不是真正的艺术，当然更不是社会主义的美的艺术。只有深入群众、自我改造都做到了，你才有真正的想象与幻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才能主观能动地运用最大限度的想象与幻想，根据实现生活的材料来进行你的塑造。我常常想创作为什么叫创作？我想是含有创造的意思在内的。黑格尔说：“如果说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想象是创造的。”的确，这是创作中间最活跃的一个阶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虚构，就没有文学。在创作艺术上，我们既要总

结自由化的教训，也要总结概念化的教训，其实两者都是违背了写自己最熟悉的人这个创作艺术的法则的。

上面分析了自由化，现在再讲一讲概念化。概念化最主要是从概念出发，为了写某一题材，表达某一主题，而不懂得扬长避短，人为的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障碍，硬着头皮去写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因此从书本上、舞台上、银幕上看到无数表现敌军司令部的時候，总是出现那么一场跳舞，千篇一律，了无新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以如此，因为不但不熟悉，甚至并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因此想来想去只有跳舞了，这是生活的贫困必然带来的艺术的贫困。这种人物是不可能有什么内心活动的，但没有内心活动的人，只能是一具外壳、一具僵尸。多年以前，我曾看过越剧《红楼梦》，我实在无法抑制地流下眼泪。试问，如果林黛玉死前没有那一腔哀怨的内心独白，能催人泪下吗？如果宝玉在祭灵时没有那万般悲痛的内心独白，能催人泪下吗？一件好的艺术作品使人一生都不能忘记，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其魅力正在于此。上面讲了许多，总起来一句话就是写熟悉的人，必须先熟悉人，这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了。但是在我们的作家之中、我们的理论家之中却常常忘掉这一点。本来不须多说，但由于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把一些理论问题都弄乱了，因此不得不重新提出问题，让真理批判谬误。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术研究，千万不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当作教条，而必须当作行动的指南。我以为在总结创作艺术这个领域多下些功夫，才能得出真正艺术的真知灼见，才能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建设。

我们队伍要不要团结？当然要团结。但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那样做，只能是开门揖盗，抹杀了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这一真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学是“和平演变”的先锋还是反“和平演

变”的先锋，全世界范围里的血的教训已经够惨痛的了，难道我们还让重蹈覆辙吗？鲁迅早在1930年就说过：“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毛泽东提出到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是鲁迅这一思想合乎逻辑的、历史的必然的发展。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在，如果我们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且都全身心的投身到广大人民的火热斗争中去，我们队伍旗帜就鲜明了，步调就一致了，我们也才能真正的团结。

最后要讲的一点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日子里来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是有特殊意义的。充满人类伟大事变的20世纪将要过去了，我们好像已经听到远方传来21世纪的晨钟。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十几年，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真是斗转星移，日新月异。去年秋天我到南方去了一次，我简直完全不认识那里了；宝钢、秦川核电站、钱塘江第二大桥、浦东开发区，一座座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厦已经或即将拔地而起；回到北京，又从报纸上看到塔里木大戈壁石油大会战的消息，像有一股热浪，一阵巨风在吹击着我，这一个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景象是多么震撼人心啊！当我们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我们今天的文艺运动，我们应该提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战略部署从何开始？那就是90年代如果有大批作家真正的长期的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火热斗争生活，我们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肯定的必然能够创造出新的高峰，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一个坚持不懈的行动。就是赶紧投身到建设战线上去，那里有最美的诗，有最美的画，有最美的歌在等待着你去发掘、去创造，在我们国家里日日夜夜都震响着开天辟地的声音，工程以光一样的速度在前进，时不可

失，机不再来，过去我们失去的太多了。

现在我们不能再失去了。如果等塔里木大油田建设成功，你再去问人家当时参加大会战时那种栉风沐雨，艰苦奋斗是怎么回事？当时你是怎么经历过来的？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这样做只能是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而决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革命作家。因此，我认为热爱生活是作家最可贵的品格，深入生活是作家最伟大的实践。90年代这十年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关键，也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命运的关键，我诚心诚意地希望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学术研究能成为决定性地通过这一伟大关键而前进的伟大的力量。

1991年第9期